

“独走论”再评析

郎维成

内容提要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起因是日本右翼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中被篡改的重要内容之一。“新”历史教科书,把九一八事变归结为关东军“独走”,推卸日本天皇及其政府在这一重大国际事件中的责任。“独走论”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第一,关东军司令官同朝鲜军司令官、台湾军司令官一样,都是日本天皇亲自任命且直接统帅的高级军官,在日本向外扩张的大陆政策指导下,日军扩张在华势力,制造事端,均能得到日本政府、天皇的认可。第二,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军政朝野都已形成分割中国独占东北的共识,并多次作为高官政见、内阁政策、日军行动准则而实施。第三,“独走论”的重要“依据”之一是昭和天皇不亲政,是“虚君”“和平主义者”。历史事实是昭和天皇不是“虚君”而是“实君”。昭和天皇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最高统帅,绝不是“和平主义者”。以昭和天皇为首的日本皇族亲自掌管指挥日本侵华部队。第四,日本战败前夕,昭和天皇与其近臣策划了为维护“国体”而将发动战争的罪责转嫁到军部身上的阴谋,编造了军部、关东军“独走论”。

关键词 九一八事变 独走论 日本侵华

中日两国围绕着日本侵华历史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场论争并没有因为中日复交和中日友好条约的签订有所缓解,相反地却是年复一年的愈演愈烈,令人不解而堪忧。

战后的东京审判,已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罪恶历史做出了结论,对其战争罪犯做出了判决,并取得了世界人民的认可。当然,由于美国从其利己主义立场出发,并没有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

彻底清算,以至于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尚在,阴魂不散。日本教科书事件就是这种社会环境中的产物。

从 50 年代起,日本教科书事件可说是三起三落了。最近这起,日本文部省竟然通过了日本右翼势力编写的从 2002 年启用的历史教科书。以前人们总认为日本社会上出现的历史翻案风是日本右翼势力煽动起来的,但这次教科书问题的发生,不能不考虑日本政府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了。

九一八事变历史是日本右翼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中被篡改的重要内容之一。“新”历史教科书,把九一八事变归结为关东军“独走”,推卸日本天皇及其政府在这一重大国际事件中的责任。“独走论”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从九一八事变起至今,日本历届政府都在千方百计地推卸对九一八事变应当承担的责任。当年九一八事变一发生,以“诚”为本的大和民族政府就声明:“中国军队破坏了南满铁路,袭击了我国军队。”一个月之后日本政府又发表第二次声明:“满洲事变完全是由于中国军宪的挑衅行为而引起的。”^①这一事变的真相,虽经国联调查团的调查,亦未能揭穿,直至日本战败东京审判之时,日本战犯仍隐瞒真相,说什么“满洲事变发端于排日之极已至发展到爆破铁路的程度,关东军不得不自卫还击”。^②

历史无情,谎言终究会被揭穿。50 年代,当年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少校参谋花谷正,吞吞吐吐地供出了“我们是如何计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的部分真相。他承认了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关东军

①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 1 卷,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234—235 页。

② 日本战犯本庄繁遗书,朝日新闻法庭记者团《东京审判》第 3 辑,昭和 23 年 1 月(1948 年)印行,第 137—138 页。

一手策划发动的,从而揭穿了当年日本政府发表的声明是一派胡言。可是日本政府至今尚未对它在九一八事变当时发表的错误声明表示悔恨道歉,相反的却仍站在战时日本政府的错误立场上,用充满皇国史观的教科书,向日本青少年灌输军国主义思想毒汁。

日本政府及军部编造的九一八事变谎言被揭穿后,日本社会上又冒出了一个关东军“独走论”,并成了今天日本文部科学省批准的新历史教科书中记述九一八事变的一个重要观点。妄图以此论点推卸日本国家发动九一八事变,即侵华战争的罪责。

“独走论”在日本社会影响广泛。对此,我先后发表了《日本军部、内阁与九一八事变》、《中国政局与币原外交》、《宇垣一成与九一八事变》、《柳条湖事件与本庄繁》等文章,从各个角度批驳了“独走论”。上述论文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在此无需赘述。现再做几点补充:

第一,“关东军司令官”同“朝鲜军司令官”、“台湾军司令官”一样,都是日本天皇亲自任命且直接统帅的高级军官,享有独自“紧急”处置,即先斩后奏之权。在日本向外扩张的大陆政策指导下,日军上上下下已形成了“独断迈往”风气,只要能宣扬“国威”“军威”,只要能扩张在华势力,都可伺机出动,制造事端。因此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才得到朝鲜军的支援,日本内阁的批准,天皇的亲自接见嘉奖。

第二,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军政朝野都已形成分割中国独占东北的共识,并多次作为高官政见、内阁政策、日军行动准则而实施。早在清朝后期,日本驻华公使就提出应将中国清朝分割为满洲、北清、中清、南清的分而治之的主张。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军事进攻路线重点是通过朝鲜进攻中国东北。日俄战争就是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东北土地上进行的争夺战。此次战后,伊藤博文与山县有朋关于占领中国东北的形式之争,就定下了日本独占

中国东北的基调。日俄四次关于“满蒙”密约,是协调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步骤。大隈重信内阁提出的灭亡中国的 21 条的第一号内容,清楚地供出了独占东北已是日本政府的国策。此后原敬内阁也好,若槻内阁也罢,都把中国东北视为应属日本之土地。于是乎这期间“满洲是日本生命线”的叫嚷甚嚣尘上。在日本国民中已形成中国东北是日本必得之地的共识。田中内阁召开的东方会议,则决定不惜以武力实行日本分割中国,独占东北的目标。田中蒋介石会谈,田中意在三分中国。首先,阻挡蒋介石北上,为此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接着田中内阁又照会蒋介石,不许北伐军进入中国东北。在这个背景下,关东军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妄图制造混乱,乘机出兵占领东北。但是,日本阴谋并未得逞。田中内阁被天皇逼垮。日本军部在总结上述事件教训的基础上,于 1931 年 4 月,制定了以“解决满蒙问题”为中心的《昭和六年度情势判断》,接着又制定了《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大纲》。关东军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且得到军部认可,阴谋策动了九一八事变,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

第三,“独走论”的重要“依据”之一是昭和天皇不亲政,是“虚君”,是“和平主义者”,并以此为根据说关东军的几个参谋违背天皇意图,擅自决定制造了九一八事变。这是对历史的极大歪曲。明治维新确立的天皇制,实际上是君主专制政体。明治宪法明确规定,“天皇是国家元首,总揽统治大权”;“天皇统帅陆海军”,“神圣不可侵犯”;天皇有立法权,议会只是“协赞”而已;内阁并不是最高行政机构,只起“辅助”作用;天皇还拥有司法权,司法机构只限在天皇名义下进行审判。不难看出,日本的立法、司法、行政机构虽是分立,但大权却集天皇一身。天皇不但在法律上是至高无上的独裁者,而且在现实国家、社会的生活中也是名副其实的独裁者。这里不防列举三件实例。一件是田中内阁是被天皇逼垮的,

说明天皇有权决定内阁的存废。另一件是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是天皇亲自迫使军部镇压下去的，说明军部只有唯天皇是从，否则自身难保。第三件是日本战败投降前夕，内阁与军部在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一事上，意见对立，议而不决，最后是天皇决定在保障天皇制国体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说明天皇握有战和大权。每当日本处于关键时刻，都是天皇亲自决定，一锤定音。

历史是清楚的，日本昭和天皇不是“虚君”，而是“实君”，日本军部、关东军都不敢违反天皇意图而擅自行动。

第四，上述足以证明昭和天皇是战争罪犯，不是和平主义者。这里不妨再看看以昭和天皇为首的皇族在侵华战争中的作用。

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达15个年头。这是日本有史以来发动的时间最长、地域最广、罪恶最重、手段最残暴的大战。在这一场举世罕见的野蛮侵略战争中，昭和天皇及其皇族骨干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角色。

九一八事变当时，日本军部是被昭和天皇任命的军阀所控制。陆军参谋总长是金谷范三，海军军令部总长是谷口尚真。可是事变后不久，日本军权就落到皇族手中，参谋总长是闲院宫载仁，军令部总长是伏见宫博恭，他们都是昭和天皇的长辈。

1937年11月18日，天皇公布了大本营令，20日设置大本营。大本营令的第一条是“在天皇大纛下设最高统帅部，称为大本营”。第二条是“参谋总长及军令部总长为其各自幕僚的首长，运筹军机，策划作战，根据最终目的，谋求陆海两军部的协力，互相策应”。^①24日召开了首次大本营御前会议。闲院宫参谋总长、伏见宫军令部总长等出席会议，并向昭和天皇奏陈了陆海军作战方针，

^① 《大本营陆军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政协译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8页。

下村定第一部长(作战部长)在做具体说明时,明确指出“令该方面军(华中方面军)做好新的准备态势,进攻南京或其他地区”。^①

中支那方面军在由上海向南京进犯过程中,昭和天皇在日军攻占南京前夕的12月2日解除了松井石根的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兼职,特任昭和天皇的姑父朝香宫鸠彦王中将为该军司令官。一本美国人写的书中,对此事有如下一段记述:

昭和天皇的“姑父承担了攻占中国首都南京的指挥任务,并住在南京的一座饭店里,观赏他的部队屠杀了10万多手无寸铁的战俘和平民。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次大屠杀。然而,当他(昭和天皇)的姑父返回东京时,裕仁却逸出常规,授予他多枚勋章,为他叙勋”。^②

当然,皇族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过程中,还有其他皇族成员担当重要军职,如昭和天皇姑父东久迩宫,早在1927年就曾尽力说服裕仁为侵略中国东北做好准备。^③昭和天皇的兄弟也都在陆海军中担任要职,具体情况在这里就不列出了。

以昭和天皇为首的日本皇族亲自直接掌管指挥日本侵华部队一直到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夕。当日本决定同美国开战之时,皇族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才退居幕后,将军部中央参谋总长的权利让给军阀掌管,先后把杉山元、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推到前台,担任陆军参谋总长;推出永野修身、岛田繁太郎、及川古志郎、丰田副武任海军军令部总长。

虽然以天皇为首的皇族退居幕后,但军部中央实权仍操在昭和天皇手中。1944年7月中旬,当塞班岛被美军攻占,东条辞去

① 同上书,第385页。

② 《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戴维·贝尔加米尼著,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4页。

③ 同上书,第187页。

首相及兼任的参谋总长职务时,昭和天皇向东条颁发诏书说:你作为参谋总长,在困难的战局下,参与了我对战争的指挥,充分履行了参谋总长职务。现在,当你辞去职务时,想到你在任职时的功绩和辛劳,我甚为高兴。^①从此也看出,天皇始终掌握侵略战争大权,这是不容怀疑的。当年任陆军省军务局长佐藤贤了少将在《东条英机和太平洋战争》一书中明确指出:“在中国事变中有关出兵、作战的事宜,无一不是依照圣命(天皇的命令)进行的。中央被交战地区的部队拖着走的事情一件也没有。而且也没有根据中央幕僚的判断下达过命令。”^②昭和天皇是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最高统帅,绝不是“和平主义者”。

第五,1943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败象已现,翌年败局已定。这时,昭和天皇及其皇族考虑如何收拾残局了。昭和天皇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就做了战败不被追究的安排,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天皇在把日本推上同美国作战前夕,天皇及其皇族在形式上与战争首脑部保持一定距离。经过不到两年的陆海大战,日本大势已去,战败结局已摆在面前。这种残酷的现实,在日本历史上是从未发生过的。面对这种情况,天皇首先想到的是保存自己及其皇族,即所谓的维护天皇制国体。为此,就要千方百计地推卸发动战争的责任。本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长达15个年头的战争是天皇制国家行为,是天皇预谋已久、内阁多次策划、军部阴谋发动、天皇又亲自统帅的日本举国一致、全力以赴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大战,天皇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是十分清楚的。但是,这时,天皇为维持“国体”,要找替身。这替身不是别人,而是昭和天皇大元帅多

① 转引自《参考消息》,1995年3月21日。

② 《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祢津正志著,李玉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130页。

年亲自统帅、享有面奏特权的“皇军”军部。

日本自发动战争以来，“皇军”在战场上犯下了滔天罪行，但却经常受到天皇的嘉奖、接见、授勋、晋级鼓励。可是战败大局已定之后，“皇军”虽然仍对天皇忠心耿耿，为天皇“玉碎”，却不时受到皇族的斥责。老奸巨滑的近卫文 及时捕捉到这一反常现象，拟定一份奏折，于1945年2月14日单独觐见天皇时呈上。天皇与近臣共同谋划了把发动战争的责任让军部承担的活动。

近卫奏折首先指出：“战败虽属遗憾，但已无可避免。”针对昭和天皇最担心的天皇及其皇族生死攸关的“国体”问题，近卫奏折说：“迄今为止英美舆论尚未涉及改变国体问题，因而仅就战败一事而言，相信当无须为国体而忧虑。对维护国体方面最堪忧的，与其说是战败，勿宁说是由于战败而可能爆发的共产主义革命。”那么在日本国内，谁是威胁“国体”存续的势力呢？令人惊异的是，近卫奏折却指向了唯天皇之命是从的军部，说军部中一部份人的“革新运动”是“特别值得忧虑的”。人们知道，30年代初期军部的“革新运动”是维护天皇绝对权威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其本质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接着奏折就把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推到军部身上，说“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之所以爆发而扩大，并终于导致太平洋战争，就是由于军部内部的这种意识的计划行动的结果”。近卫真是昧着良心说瞎话。历史事实是天皇嘉奖了九一八事变的策动者，卢沟桥事变是近卫任首相时发生的，其时近卫主张扩大战争的决心比军部还坚决。近卫内阁不但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而且又接连两次组阁，把日本推向了太平洋战争深渊。可是近卫面临战败结局却把自己同军部共同发动战争的责任全都推给军部了。近卫在奏折中还一再强调从组织上“清洗这一派”，并表示只有向英美“靠拢”才能“维护国体”。

近卫奏折符合昭和天皇意愿，昭和天皇当然采纳了近卫的主

张。昭和天皇“独白录”说明了这一点。

所谓“独白录”，实际上是昭和天皇指示身边亲信记录他在一段时间内关于战争责任的言论录。那么，是哪一段时间的昭和天皇言论呢？是1946年3月中旬到4月上旬不到一个月期间的言论。昭和天皇自己说，其身边亲信听记，然后整理成文字材料。那么又为什么要在这个期间专门谈战争责任问题呢？在此之前的1月19日，占领日本的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命令成立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时国际舆论大都认为昭和天皇是发动战争的战犯，理应受到审判。对此天皇及其皇族都很紧张。所以昭和天皇在2月下旬就指示身边亲信，准备一份昭和天皇自己的言论录。《独白录》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制成的。

《独白录》从田中内阁谈起，一直谈到当时的审判战犯问题，尽管洋洋几万字，但中心内容是讲日本是君主立宪国家，天皇是无实权的“虚君”。天皇自己是“主张和平”的，反对“扩大事态”。强调军部“他们的意见与我的不一致”，“当时的参谋本部，实际上处在石原莞尔的控制之下”，等等。显然，天皇把发动战争的责任推到军部身上，甚至达到了指名道姓的程度。

《独白录》，在当时并没有发表。但整理记录的天皇身边亲信却把昭和天皇的意愿传答给了美国占领军。昭和天皇的这些亲信架起了一座昭和天皇通往美军司令部之间的桥梁，发挥了沟通的作用，甚至参与了选定战犯的活动。

美国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和美国当局为了利用昭和天皇投美反苏的立场，帮助美国占领军对日本的统治，并把日本变成美国称霸亚洲的基地，不顾国际舆论的要求，决定不把昭和天皇定为战犯。1946年4月29日，发表对东条英机等28人的甲级战犯起诉书。6月18日美国首席检查官季南言明，不把昭和天皇作为战犯交法庭审判。昭和天皇与美国占领军就是如此勾结，互相利用，达

成妥协的。

从《独白录》中清楚地看出,昭和天皇推卸发动战争责任的最基本的观点就是“独走论”。此后,“独走论”就成为日本社会上认识这段扩张历史的主导观点,一直到今天,久盛不衰。

“独走论”的发明者是昭和天皇,目的是推卸战争责任。昭和天皇既然如此,他指挥下的“皇军”当然也如法炮制。军部把昭和天皇推到自己身上的罪过又推到关东军身上,说关东军不执行军部命令擅自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更是振振有词地说,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制造的柳条湖事件,我根本不知道。而板垣又是如何说的呢?“板垣在东京法庭受审时的供词可资说明:‘自己受参谋长之命,负责参谋部内的联络和涉外事项’。言外之意他是奉命行事,没有越轨行为。作为旁证材料,当时的满洲青年联盟理事长金井章次也说过:本庄繁在‘满洲事变的时候,就对我说过:人们都说板垣这个人只听上司的话,独断专行,其实绝不是这样的,凡事都是同我充分商量之后才干的。’”^①

昭和天皇放出的“独走论”在日本泛滥半个多世纪,把水搅混了,是非混淆,使众多的日本国民至今难以弄清谁是侵略战争的发动者。首要战犯没有受到制裁,东条英机等战犯的灵位也以为国捐躯之“神”移入靖国神社,供日本国民悼念。日本在半个世纪内就将历史篡改到了如此程度,且不想就此止步,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作者郎维成,1935年生,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刘兵)

① 良邑:《柳条湖事件与本庄繁》,《外国问题研究》1992年12期。